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史海钩沉】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李 逊
【各抒己见】	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责任问题	李仕林
【抗拒遗忘】	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邢小群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史海钩沉】

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的蜕变

• 李 逊 •

公社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宗教。（1）纵观毛的一生，除了年青时  
对公社理念的不倦探索甚至实践，执政后更曾掀起两次大的公社热潮：第一次从中国文化溯  
源，第二次向西方巴黎公社借鉴。两次热潮事先都未经中央决策层讨论，最后都以失败而告  
终。尤其第二次公社热的失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二天  
（如果从巴黎公社正式成立算起应该只有六十二天），留下更多的是彼岸的理想，而不是现  
实的操作样本；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叶公好龙和实用主义。当理想危及执政党  
的执政地位，便马上毫不犹豫地离弃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巴黎公社原则。（2）本文所要讨  
论的正是巴黎公社原 t 在文革中的这个蜕变过程。

一、巴黎公社——毛泽东的乌托邦

第一次公社热在1958至1959年。一些农村合并合作社办“大社”，以调动更多  
生产资源。毛泽东非常支持，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型。之后，毛泽东在多次  
谈话和视察中都提及公社设想，赞扬说“人民公社好！”全国于是掀起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热  
潮。毛甚至在城市也推行“公社”，到1960年7月，全国所有城市都基本建立了城市人  
民公社。这是毛的第一次乌托邦实践，K将它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相比较，试图  
从中国文化的“大同”梦寻找公社的源头。虽然毛在此期间也曾将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与巴  
黎公社相提并论，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  
（3）但纵观公社热的1958和1959年，在一片“共产风”中，毛关心的主要还是经  
济结构方面的所有制问题：公社的“公”，公到哪一步？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全民所有制？  
1958年以“共产风”为核心的公社热，很快遭到经济规律的严厉惩罚。国民经济持续三  
年严重衰退，全国性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人民公社的经济核算不得不退回以生产队为基  
础，而生产队就是原来以村为建制的农业合作社。不过，1958年的公社热还是在中国农  
村留下深刻印记：原来的乡政被合一，从政体上改变了农村的结构。

1958年公社梦的挫折没有浇灭毛泽东对乌托邦的追求，八年后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提出了又一个乌托邦模式——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的自给自足封闭式经济共同体，也即“五七指示”。纵观1958年的公社热以及以后整个文革的过程，这封信中才是毛泽东心中的真正追求。但这个公社路径很快从东方切换至西方。半个多月后，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毛将此评价为“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4〕聂元梓大字报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公开的下层对上层的批判，毛视之为底层的发动。接着，8月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要求从省市到基层单位，都建立领导文革运动的“文化革命委员会”。〔5〕《十六条》中规定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人员的产生，必须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这条是陈伯达加的，毛泽东同意。和毛一样，陈也有着浓厚的公社情结，不过更多的是巴黎公社情结。陈后来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任何领导人都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6〕

此时文革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化还没最后完成。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既有原来党组织的“依靠对象”，也有后来的造反派，1966年的8月至9月，他们都可算是文革积极分子，以对文革的不同理解积极投入文革。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骨干的王秀珍，被选为她工厂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并任主任；而以后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的王洪文，则未能进入厂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时间不长，到当年10月，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巴黎公社式选举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很快名存实亡。但是，以巴黎公社为资源的最初的文革社会动员，就这样唤醒了底层民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以及对当政者选择权利意识的苏醒。

毛泽东发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级党组织屡败屡战，但不到两个月就兵败如山倒。在上海，随着更多的底层民众倒向造反派，保守派工人变相罢工，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徐景贤率科层干部反叛，到1966年底及1967年初，上海的社会生产秩序愈来愈混乱失控。全国的形势同样如此。

在这样的时刻，是恢复原有的权威权力和秩序，还是摧毁一切秩序，以一个新的权威权力控制局面？毛泽东选择了后者。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要《红旗》杂志刊登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文中着重提出马克思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既然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一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派去上海，要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观察上海运动。

## 二、毛泽东要上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领导的“上海公社”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抵达上海的前后，上海发生一系列事件：1967年1月3日，《文汇报》被本报社造反派接管；1月5日，《文汇报》刊登以王洪文“工总司”为首的十一个造反组织的传单〈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呼吁工人回生产岗位；1月9日，《文汇报》又刊登“工总司”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传单〈紧急通告〉，要求刹住正在蔓延的资本主义风。

在此期间，张春桥也以他对文革的理解指导上海运动：1月6日，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十几万人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大会颁发通令要求中央对

上海市委彻底改组。1月7日，造反派又以“工总司”为主，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被张春桥称作“经济苏维埃”，说可以代替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当时称“市人民委员会”）。〔7〕

张春桥自以为沿着毛泽东的思路开展上海文革，但毛对张关注的这个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不表态，对“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没有回应。1月8日，毛泽东却对《文汇报》的被接管高度评价，称这是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8〕1月10日，毛又对传单〈紧急通告〉做出更强烈反应：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造反派组织掀起接管高潮，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也争先恐后地接管市委和市人委各部门。而此时，周恩来、陈伯达和张春桥等都不赞成这样的以造反派组织替代原来科层的接管。周恩来主张“督管”，陈伯达和张春桥主张“干部工作，造反派监督”。但毛不同意他们的思路，毛泽东说：“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9〕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关于夺权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和党中央号召夺权的第一篇公开的正式文字。〔10〕上海和全国——从市委、市人委到基层党政，立即掀起夺权高潮。

夺权后成立怎样的政权形式？毛泽东的意见，要上海建立临时权力机构。毛要成立北京公社，拟名单后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电话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打的，张春桥接电话后，即向造反派建议，将上海即将建立的文革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1〕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上海造反派成立了由外地和上海共四十一个造反派组织联席的新政权筹备机构，并于2月2日决定成立文革新政权“上海人民公社”。徐景贤负责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根据参加起草的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等众人的意见，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1871年3月法国巴黎公社原则写进宣言：“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12〕

徐景贤和造反派对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究竟知道多少？他们是临时查书本，还是原来就了然于胸？但不管造反派对巴黎公社是否真正了解，有一点众人却是明确的，那就是：公社官员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民众的选举。这也是《十六条》中着重强调的。可以说，《十六条》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深入人心，被民众视作推选自己代表的理所当然的方式。这是毛泽东对民众的文革承诺，也是将久违了的直接选举权暂时还给民众。

马克思所总结的另一巴黎公社经验之一：“无产阶级决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把它彻底打碎”，也被反复强调。这一时期上海所有的报刊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都是一片“彻底打碎”、“彻底改善”之声，以马克思的经典著述，为愈演愈烈的夺权寻求合理合法资源。

### 三、从“彻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毛泽东又一次迟迟不表态。《人民日报》一直不刊登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只有上海的报纸天天自唱赞歌，因为毛的思路又有变化。1967年2月6日下午，毛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叶剑英等开会。谈及上海的夺权时批评说：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

啦？〔13〕而事实上，将夺权机构命名“公社”是执行毛的指示，上海并非自行其事。只是毛的思路变化太快，这次他又改变主张。王力回忆：“主席虽然叫上海筹备成立公社，但究竟什么时候成立，怎样成立，毛主席的想法改没有改？他的思想过程经常反复，也许他正在考虑，上海就那么做了”。〔14〕陈伯达没有及时将毛的变化转告上海，造成上海一时未能跟上。

2月12日，毛泽东将张春桥和姚文元叫去北京谈话，谈话中心就是上海人民公社改名问题。毛最关心的是“党放在哪里”？据2月24日张对毛讲话的传达：“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得要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15〕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是“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这也是文革前各类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或原则的众多文章所反复强调的。毛泽东要打碎的，是被他认为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以及他深恶痛疾的科层官僚体制。毛显然希望通过文革弱化科层官僚职能，但对于党牢牢掌控国家各级政权的政权形式，他绝不会放弃。毛此时已经意识到，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市民自治，由市民推选自己的代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连控制这个国家机器的政党一起打碎？上海所有的群众组织，最关心最起劲的就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代替市委，根本没有想到再给市委一席之地。这一时期上海报纸上所有关于“公社”的文章，都是欢呼对上海市委的“彻底砸烂”。事实上，从市委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此时确实都已瘫痪，失去了控制能力。张春桥修改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布打碎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即使是张春桥也没有想到新政权和共产党的关系。〔16〕

但是，毛泽东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政权形式，实际摒弃了中共市委。那么今后共产党放在哪里？在群众组织联席会议之上，还必须有个党，必须由党领导新的政权机构。“党的领导”是毛的文革底线，也是对巴黎公社市民自治模式的不信任和坚决否定。

党是中国1949年后建立的国家机器中最坚硬最不可动摇的核心，政府只是被党指挥和使用的具体操作工具。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建构的一切，包括政府权力和民众权利，一切都在党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绝对不会放弃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权力。1月30日，毛泽东要《红旗》杂志刊登的社论中，还提出要彻底打碎国家机器，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但不过十天，毛的口径就变了。张春桥2月24日讲话中，有一段话显然也是毛泽东的意思：“有些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口号是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要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本主义专政。所谓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行了，要彻底改善嘛。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的改善”。〔17〕

从“彻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是一个非常大的观念性改变。如果以巴黎公社式的所谓“彻底打碎”为准则，应该就是连执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也一起打碎，另塑市民自治的国家形式。这显然是对共产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政权形式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不能接受；而保留了党的领导，“彻底打碎”便无从谈起。而对“彻底打碎国家机器”的否定，是从巴黎公社原则的退缩，而且是关键性的退缩。

此外，马克思所说的“打碎”究竟是什么含义？造反派的理解，就是摒弃原来的政权机构和人员。所以，刚夺权时的文革政权，机构名称全部改变，不称“部”而称“组”或“室”。原来的科层人员，只要带“长”字的都一律不启用；新的负责人不称“长”而称

“召集人”或“勤务员”。废除官僚科层制也是造反派对原有国家机器改革的尝试。上海人民公社最初的办公室设置非常精简，而且大都与革命相关：组织组——负责公社成员以及欲加入公社的群众组织的登记审查工作；政治宣传组——负责对新闻、出版、文艺等宣传的指导；联络组——负责各群众组织及各基层革命造反派的联络及协调；调查组——负责情况调查、政策研究以及文件起草等；保卫组——负责大型群众集会的保卫工作；接待组——负责接待处理群众来访及外地串联人员问题；办公室——负责处理公社内部日常事务；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负责解决工业和交通行业的生产问题；以及后勤组。（18）

但是，这个扁平化的八组一室设置，看似精简，然除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与上海生产及生活有关，其它组、室的设立，都只是为了适应文革的政治运动，解决群众组织在文革政治运动中的需求，而不是为管理一个大城市的生活和生产设置。而且，即使是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也因工作人员大都是红卫兵而没有管理经验、更没有管理网络。虽然曾经解决不少应急事情，但大多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缺乏全局和系统的管理调度，充其量只是个临时性的应急机构。于是，这个八组一室办公建制，只运行了近一个多月，3月底便改组，当时称之为“调整”。调整后的各个组的职能，其实就是文革前市人委的各部的职能，只是“部”被改称为“组”。

就这样，市革委会各职能组、室的设置，实际回到了文革前市委和市人委的建制。不同的只是党政一元化。理想中的巴黎公社式简约办公机构，基本没能实现。

#### 四、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民主协商”

对于巴黎公社的原则，民众最直接的理解就是《十六条》中许诺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但是，张春桥在修改徐景贤起草的公社宣言时，将这个内容删去，只说公社领导成员，“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还在上海的造反派紧锣密鼓地筹备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关于选举的思想已经改变；更可能毛本来就没有想要真正实行直选。1967年1月15日，“二兵团”、“上三司”等几个上海的工人和红卫兵造反组织接管上海市委和市人委，并提出要张春桥、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负责人。毛知道后，让王力打电话给上海，要张春桥转告“二兵团”等群众组织，赞成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兼副市长。（19）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是全面和直接选举，而毛泽东在上海的民众还没有选举之前，就自己直接钦定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2月初，毛泽东又根据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提出让军人进入新政权的“三结合”思想，即革委会成员必须由三方面组成：原来的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取消常备军本是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之一，而毛泽东规定军队是“三结合”不可或缺的一方，实际用国家机器为文革新政权背书。在这个意义上，上海人民公社和全国所有省市革委会，都已经不是巴黎公社意义上由市民自由联合建立的政权了。

而且，上海人民公社只是由那么几个、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推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公社组成。这十几个造反派组织，既非民众推举，在民众中也只是极少数。大批公民完全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被剥夺对“公社”的选择权。各级革委会的建立也同样如此。1967年“一月夺权”后，最初“三结合”的各级革委会，军方是委派的，老干部是几个造反派组织协商并经上级批准同意后再交由大家选举的。民众从来没有资格对全体“三结合”成员进行投票，更不要说直接选举。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委会，至少1970年之前，从来没有进行过选举。1970年上海报给中央的市革委会名单，全部都是任命而非选举产生。

不过，虽然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被如此大大打了折扣，但在基层，“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一方的选举还是经群众讨论产生的。虽然群众代表的名单也是事先由上面商量好的，但至少还让群众参加讨论。不但造反派有投票权，就是保守派和不参加任何派别的群众也有投票权。于是，1967年各地革委会普遍建立时，许多地方的选举结果很不利于造反派。尤其1967年3月23日，天津成立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选举出的“老保”（即保守派）占多数，“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20〕一些知名造反派落选。

天津选举的结果对文革派是震撼的。文革以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为最初的社会动员，而最先接受检验的却是文革派自身。为此，中央文革小组在1967年4月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时，由周恩来表态：“不能用选举的办法”，“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康生则明确提出：“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毛泽东更在之后不久的一个讲话中，表示了对选举的不屑：“不应该忘记十月革命的经验，十月革命并不是选举成功的，而是用战斗打出来的”。这些声音，表达了来自文革决策层的对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的直接否定。〔21〕

1967年9月，毛泽东提出要在第二年或后年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毛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10月21日，姚给毛的调查报告由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报告第一段便谈九大代表如何产生：“是不是要从下而上一级一级选上去？少数同志认为要这样，多数同志认为不一定”，“过去选举，其实候选人也是上面决定的，经过一年文化大革命，各种人政治面貌、好人、坏人，看得更清楚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清楚，代表可以各方协商产生，在市、区里开党员大会通过”。〔22〕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这个报告中悄悄变异。

第二年，《红旗》杂志展开对“迷信选举”的批判。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中提出：迷信选举，是形式主义，也是一种保守思想，必须彻底批判；“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有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通过新的党章。其中，将八大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的有关条款全部取消，改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从“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到“民主协商、选举产生”，看起来似乎只是事先多一道“民主协商”程序，“协商”之后仍然“选举”；但实际上，这是对文革初期巴黎公社式直接选举权利的否定；是文革前上面指定候选人，下面举手通过式的“选举”的恢复。所谓的“协商”，就是领导层的几个成员，真主意假商量，象征性地“听取”各方意见后，根据上面的标准和要求决定候选人名单，而且是等额选举的候选人名单。选举人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更不要说推举自己心仪的候选人。

1966年8月以来群众直接选举干部的权利，就这样只行使了两年就被悄悄置换。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又一次后退。这次后退，完全彻底地结束了文革对直接选举权的承诺。

## 五、从“公社委员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工人”到新干部“补助”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的初稿中，被张春桥删去的还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23〕而这正是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的又一原则。

1949年后，干部工资普遍高于普通工人工资。工人中工资最高的八级技术工人，文革前的工资只相当于15至17级干部收入；市级领导的工资更是数倍于普通工人。虽然在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批判期间工资被“冻结”，但一旦恢复工作，被扣工资立即补发。还有那些被“解放”但降级使用的干部，工资一般也不会随之降级。整个文革十年，对干部的工资标准基本没有触动。这是巴黎公社原则在强大的干部阶层前的却步。

相比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尤其是老干部工资的原封不动，文革中进入各级科层的新干部工资和职务并不挂钩。所有当了干部的原工人，工资仍由原工作单位按文革前夕的原工资标准发放。甚至王洪文，当他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他的工资仍是他原来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保卫科干事时的64元，而且仍由上棉十七厂发放，每月派人给他送去。

新干部当了领导，体制身份还是工人编制，从原来工作的工厂领着原来的工资，一般每月只有五六十元，而担任同样职务的老干部工资一般都在一二百元以上。老干部高工资的依旧，对担任了同样级别职务的新干部肯定会带来心理冲击，也是新干部的现实榜样。那些新干部，过去身在底层时，并不了解干部特权到何程度。而当他们也跻身上层，才窥到一豹之斑。文革高举批判的旗帜，但文革的批判没有触动政治等级身份制，包括干部等级和干部特权待遇，尤其没有建立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制度。文革破除的只是被打倒干部的特权。只要还在台上，或者只要恢复官职，待遇等级一如既往。这些“待遇”是那样理直气壮，为新干部作出巨大榜样。许多新干部在最初掌权时，很注意防止特殊化，但不受限制的权力很难抵制各种诱惑。当权力找到理由，便会很容易击垮道德的防线。

为了新干部的职级与工资不匹配的问题，1975年1月王秀珍去北京参加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曾特地向张春桥汇报关于上海调去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生活补贴问题，请示说他们生活有困难，是否继续发给补助，或者由中央直接管。张春桥表示，这些事情本来都应由中央组织部分管，但组织部的工作现在还未开展，以后再说。对于文革中被提拔的新干部的工资标准，据说1973或1974年左右有关方面曾经请示过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可以比他们原有的工资高一点，但比现在所担任职务的工资低一点。（24）如果周恩来确实有过这样的指示，那他的意思显然是：可以适当增加一些，但不要加到同级干部的工资标准。

此外，经张春桥同意，1971年开始，新干部生活有困难时可以补助，由王秀珍批准便可支付。担任了市革委会工业组负责人的工人造反派陈阿大，自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每年两次补助，每次80至100元。其他工人造反派的补助大都是一次性的，主要是大病诊疗费一类的应急性临时补助。至于王洪文，自1968年以后，则由市革委会办公室每季度给他发放“生活补助”200至300元。这样，加上上棉十七厂发的工资，每月共130至160多元，相当于上海12至14级干部的工资。王洪文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据说周恩来曾经就工资标准请示过毛泽东，毛说：“和你一样”。周便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按自己的工资标准给王洪文发工资。但王洪文不肯要，说我拿那么多，下面和我一起出来的人怎么办？第一个月的这笔工资他就没有拿，以后也还是在厂里领取原来每月64元的工资。（25）后来上海方面则又将给王洪文的“生活补助”每季度增加到500元。据统计，从1971年到1976年8月的五年八个月，共补助1.1万多元；其中1974年到1976年8月的两年八个月，共补助7,000多元。对其他调去中央的上海新干部也是这样提供补助。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说：“他们在北京很辛苦，中央没有人管”。马天水指示，给去中央工作的上海工人干部尤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如金祖敏等发补助。于是每人每年一般补助二百多元，多者每年近千元。（26）

所谓官员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只是对文革中被提拔的工人新干部而言，老干部的工资始终没有降低。而且根据已经实行的对新干部发给补助的政策来看，很可能对新干部工资水平的限制也只是暂时的。如果这样的补助政策持续并扩大实行，这些新干部的实际收入也将超过普通工人。与此相对照的是：对于广大普通工人而言，与他们生活休息相关的工资标准，始终没有向官员工资水平接近的迹象。不但如此，甚至下降。文革前上海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起点工资，一般在42元左右，文革中被降到36元。因此，就老干部不被触及的高工资以及新干部的“补助”而言，巴黎公社的这个原则在真正意义上也是并未被执行。

## 六、从“工人武装”到“民兵指挥部”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又一原则是取消常备军，代之以公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这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虽然没有提及，但毛泽东文革中确实有武装造反派的念头。

毛泽东对文革初期军队不支持造反派始终不满。1967年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因被保守派包围住处，毛仓皇逃离武汉，坐飞机往上海。毛认为军区和武装部支持右派。他早就对军队介入文革却镇压造反派不满，提出要“武装左派”。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赴京代表时，借河南一个群众组织所提口号，表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27〕

8月4日，上海以王洪文的“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集结几万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的另一造反派组织“联司”，毛泽东观看了现场录像的全过程。当天，毛便给江青写信说：现在有75%以上的军分区干部支持右派，因此当前主要任务，第一是武装左派的问题，决定发枪。这封信当即在中央部分人中传阅，王力感觉到：“毛主席那时已经明确地有建立第二武装的思想，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本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现在好像不太够了，要很好改造，要搞第二武装，直接把所谓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武装起来”。〔28〕而张春桥则在三天后的8月7日打电话给王洪文，支持建立上海的工人武装“文攻武卫”组织。8月26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筹备小组”，上海的文革工人武装就此建立。

毛泽东武装造反派的想法是否从巴黎公社而来？目前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至少，毛对军队普遍抵制文革有着某种担忧，他要再造一个制约反文革势力的左派武装。据说，毛曾对张春桥说过：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有枪，中国的工人就不能有枪？〔29〕1967年全国武斗频繁，群众组织从军队方面抢枪事件层出不穷。但毛认为抢枪情况不严重，而且说对造反派夺去的枪不要急于收回。〔30〕自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后，全国其它地区也有成立文攻武卫组织，但后来全部都被解散，只有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保留了下来。中共九大以后，民兵活动恢复，统一称为民兵，上海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也于1972年改名为民兵。

上海文革中的民兵建设始终为王洪文所关心。文革前，当王洪文还是上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时，就曾经是厂民兵连的连长。可以说，王对文革前的民兵工作非常熟悉。他始终将“改造民兵”作为自己的工作强项。为了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寻找改造民兵思想的理论资源和政策依据，王洪文在市委写作组的辅导下，学习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前者将“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总结为巴黎公社的重要经验之一；后者则专门论述革命不能只限于夺取政权，还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此外，王洪文还特地学习列宁的《军队和革命》，这是一篇专门论述军队与国家关系的文章。文中指出：“在各个地方以及一切国家里，常备军与其说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内部



敌人的。常备军到处都成了反动势力的工具”。显然，王洪文是要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他建立和扩张工人武装的依据。1975年10月13日，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等传达王洪文关于改造民兵的有关指示时，强调这是王洪文考虑的方向性问题，“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31〕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武装是王洪文心底的情结。

而从1967年11月25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份要求改名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王洪文们对这个武装力量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这个名称包涵的面过于广泛，没有体现出工人武装的性质，建议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工人武装指挥部’”。〔32〕虽然这个建议后来没有被采纳，但是从这个名称建议可以看出，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给自己的定位是上海工人武装。这个“上海工人武装”的概念，和文革前的“民兵”不同，后者出于藏兵于民和全民武装的理念，而前者则更有着阶级武装和地区自卫队的意味。

如何建立这样的工人武装？1967年7月30日张春桥给毛泽东一封信，信中提及，毛曾经多次提出要改造民兵。〔33〕虽然尚未查到毛对改造民兵的原话或张春桥的解释，但从之后王洪文对民兵改造的实际措施可以看出，王“改造民兵”的核心就是尽量剥离军队对民兵的控制。文革前的上海工厂民兵只是分散的存在，没有纵横向的联系，联系各厂民兵的枢纽是各区、县武装部。文革中的上海民兵建立了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这实际是独立于军队之外的纵横指挥网络。虽然上海警备区平时都派人参与工作，而且民兵指挥部与参加工作的军人关系也很融洽；但民兵指挥部一旦举事，完全可以抛开军队的领导。

上海民兵的形态引起军队警惕，不少军内干部提出，王洪文是在改造民兵的借口下建立“第二武装”；上海警备区对王洪文改造上海民兵的做法也软硬抵制。王洪文一直想把军队在上海各区、县的派出机构——武装部，剥离出警备区，因为军队对民兵的领导是通过区、县武装部施行的。武装部若划归地方党委领导，军队对民兵的领导也必然削弱许多。但王洪文的这个设想遭到上海警备区的抵制，最终没有实现。

## 七、巴黎公社原则与现实的冲突

巴黎公社的核心是自由联合与直接民主，但恰恰这两个核心追求，是集权主义国家最不容许的。文革虽然对民主网开一面，实行“大民主”，然也只是毛泽东暂时的恩准，而非公民权利的兑现。《十六条》大力鼓吹的直接选举，只实行了很短时间便名存实亡。这是当政者对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不自信，也是对还政于民承诺的赖账。中共执政前召开的七大和执政后召开的八大的党章中，都有专门章节提及党的各级组织必须选举产生。虽然在实际运作中，真正的选举从来不存在，大都是上面决定后才让下面举手。但至少，这样的潜规则不会被理直气壮地作为明规则写进章程，“民主选举”始终是漂亮的表面承诺。但到了九大，这个权利被明火执仗地剥夺——被选举人名为“协商”，实为指定，党员只有举手赞同的份，这是对八大党章甚至七大党章的严重倒退。党员的权利如此，普通百姓的选举权更不消说。

倒是张春桥，对选举的内涵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多次对红卫兵和造反派强调：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最重要的是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代表。但即使是“可以随时撤换”，真轮到张春桥自己头上，也是不准实行。上海两次炮打张春桥，都是质疑其权威和权力，背后就是撤除其职务的意愿，但张春桥并没有因此被撤换。对张春桥权力质疑者，以后都被整肃甚至关押。

如果说直接选举和“官员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的巴黎公社原则在文革中没有被真正贯彻，是当政者对承诺的失言，因为触及自身利益或执政危机，所以找尽理由不予实行；那么，巴黎公社的另外两条原则“彻底打碎国家机构”和“取消常备军”，则是因为与现代社会和国家管理相悖，无法实行。

文革中的造反派试图按巴黎公社原则“彻底打碎国家机器”，另建全新的简约革命机构。但是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专业分工和分层是现代社会的必须和必然，简单的政治和革命机构，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产和生活管理。事实上，革命者的理想社会与当政者的政府政权之间，经常横亘着巨大的现实鸿沟，只有时间才能在彼岸与现实之间建起实践的桥梁。十九世纪的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法国国防政府逃至凡尔赛与普鲁士谈判，普法双方都无暇顾及巴黎；而组织了巴黎公社选举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只是匆忙成立的应急机构，并不具有自觉意义上的对国家机器的重组意识。而且宣布起义的巴黎市民组织（十天后选举成立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为生存与前往镇压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在这样权力真空中匆忙起义成立的市民自治，存在时间又如此短暂，所有的措施和理念来不及让时间检验，因此无法具有普遍实践意义。事实上，巴黎公社就是一场蒲鲁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实验。

至于“取消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也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虽然文革中并没有强调这一原则，但上海民兵的建立却是有着对巴黎公社工人武装的模仿意味。而马克思提出废除常备军，因为他认为常备军是国家的暴力工具，专制政府的支柱。这也是巴黎民众对法国中世纪市民自治的怀念。但纵观当代社会，除了一些小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禁止拥有常备军的战争发动国家，常备军几乎是每个现代国家的标准配备。只要国家不消亡，军队就不可能不存在，因为军队是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最坚实屏障。而在现实中，防止军队成为镇压人民的暴力工具，主要不在于废除常备军，而是防止军队成为某一个党或某一个派别的专制工具。所以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不介入党派斗争。而文革一方面鼓吹巴黎公社的这个原则，另一方面军队比以往都更大程度介入党派斗争，而且掌握着更多国家和地方权力，这和毛泽东的“总得有个党”是一致的。当党凌驾于国家和一切之上，军队国家化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容许民间武装对抗国家军队。王洪文以巴黎公社为理论资源，大力扩张民兵，希图建立一支能抗衡反文革势力的地方工人武装。但他显然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巴黎公社工人自卫武装与中国民兵传统完全不是一回事。“民兵”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始终是军队的辅助和延伸，在政府的控制下，作为国家军队对外抵御侵略、对内镇压动乱的补充和后备力量，是藏兵于民；离开了国家控制的民间武装，是土匪、谋反和叛乱。而巴黎公社的工人武装“国民自卫队”，从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来，本质上是与国家军队对立的。国民自卫队不是巴黎公社的产物，而是西方市民自治的政治文化产物。西方民兵作为公民防止国家滥用权力和捍卫自治共同体的武装组织，本质上是与西方文化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相一致的。而在中国，国家从来高于一切。当别的领域和语境都是国家至上，而民兵却要制约国家扩张权力，显得非常不协调，也根本不现实。加上中国民兵辅助国家的传统，上海民兵自然会被看作有可能反叛国家的武装力量，遭到军队的抵制。

## 八、结语

文革最初以巴黎公社原则为社会动员资源，到后来宣布“彻底改善”国家政权是反动口号，到批判“迷信选举”，巴黎公社之梦就这样被悄悄搁置。直到1971年3月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之际，报刊上才又大张旗鼓地宣传巴黎公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但社论强调

的重点，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修正主义。自此以后，决策层以报刊社论宣传强调巴黎公社之声势不再。直到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上海的市委写作组和总工会才又想起了巴黎公社，试图发动巴黎公社式的起义。这场未遂反抗，最终结束了文革的巴黎公社幻象。

从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到1966年5月的“五七指示”、6月的“北京公社”、1967年的“上海人民公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公社热，虽然两类公社的源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1958年的农村人民公社热，是官员自上而下对生产资源的“共产风”，那么文革中的公社热，则是底层民众企图借毛泽东的乌托邦参与权力的自下而上的“共权风”。而毛泽东政治性格中的看似两极却如此紧密契合的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两场公社热尤其是文革的公社实践中表现到极致，然都遭到失败：前一次是经济规律的惩罚；后一次则是革命的终结。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文革在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延长线上走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失败的样本真正终结了20世纪的所有革命”。〔34〕

是的，文革的巴黎公社是公社幻象的最后返照，从此中国不再有“公社”的回声。

注释：

1、本文是对本人《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部分论点的展开，所以文中的有些资料及论述，与书中有所重合。参见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

2、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主要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本文关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的阐述皆出于此文。

3、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429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转引自郑谦《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4、《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4日，（转引自郑谦《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节》，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5、1966年8月间根据《十六条》的要求，普遍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领导文革政治运动的临时机构，不同于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6、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第290页。

7、转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1994年，第246页，未刊稿。

8、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第780页。

9、同上，第798页。

10、同上，第780页。

11、同上，第889页。

12、徐景贤：《十年一梦》第71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出版。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1页。

14、王力：《王力反思录》，第890页。

15、《张春桥姚文元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2月24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 16、《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海《解放日报》1967年2月7日。
- 17、同注15。
- 18、资料来源：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上海市档案馆藏。
- 19、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电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 20、《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时的讲话》，1967年4月7日，《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21、毛泽东1967年8月13日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181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 22、《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的通知》，1967年10月21日。(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 23、同注16。
- 24、据曾是上海“工总司”骨干的戴立清对笔者2013年询问此问题时的回忆，说他在一次几个工人新干部议论工资时，听当时任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负责人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金祖敏说的，王秀珍也在场。笔者后来为此专门问过王秀珍，王说，那是针对中央的工农新干部，而且高多少低多少，也没有明确规定。
- 25、笔者2014年从曾是上海“工总司”成员的王腓利处得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话是王洪文对妻子崔根娣说的。而崔根娣又告诉了王腓利：王洪文被捕后，她去北京取回他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信封，里面是四百多元现钞。后来她探监时问王洪文是怎么回事。王洪文告诉她，那是他刚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第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他的工资。这个钱他一直没有收下，其后的工资一直都按他的要求，由上海他原来的工厂发给。但是这个钱已经发出并做帐，办公厅不能收回，所以后来就作为王洪文的物件交给了他的妻子。
- 26、这一节关于上海市革委会给新干部发放工资补助情况的资料来源：马天水1976年11月5日《我的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8日印发；以及张敬标1977年1月7日《我的揭发交代》，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1月24日印发。
- 27、江青的讲话转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9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北京。
- 28、王力：《王力反思录》，第853、1012页。
- 29、这是戴立清2015年对笔者回忆的。
- 30、张春桥1967年7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转引自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16期（1980年12月）。
- 31、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22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1年1月编。
- 32、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关于发展、壮大工人武装队伍的请示报告》，转引自《“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记事》，载于《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第22期，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1981年1月编。
- 33、转引自上海警备区民兵斗争史资料组编《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1980年12月第16期。
- 34、严搏非：《幻象的湮灭》，未刊论文稿。

~~~~~

【各抒己见】

试论文革中“全面内战”的责任问题

• 李仕林 •

近几年，民间悄然兴起一股回忆与研究文革史的潮流。留下史实和教训，给后人以警示，本属功德无量。但屡屡出现与常识和记忆相反的东西，不禁渐生疑窦。

文革的深刻教训孕育了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天下的共识。当然，当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还在探索。任何历史研究都是以史鉴今的，想来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会例外。那么，那些与天下人记忆相左的“文革历史”，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清华大学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许多重要的事件，甚至文革历程中一些重要转折点都发生在那里。这些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见证。不可否认，即便同为“亲历者”，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受，回忆出来的“历史”，真实程度很可能大不一样。人们往往相信当年那些头面人物叙述的“历史”，以为这可能是最真实的。我则不以为然。

沈如槐和蒯大富近几年相继回忆了清华两大派的内战历史。其细节的真实，我不否认。但总体的失实，则值得讨论。

#### ◇ 一个新天方夜谭

2004年沈如槐在香港出版了《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全书主调是论述414派同团派内战的正义性。2007年，沈如槐、陈楚三又联署发表文章《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414思潮”的正确性、正义性。

最核心的论点是“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更有趣者，蒯大富口述历史《岁月流沙》也间接地“证实”了沈如槐的这一立论。

在“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一节，蒯大富讲述了清华内战的原因。他说，清华形成两派可以分成“浅层”和“深层”两大原因。

而深层原因，蒯大富回忆说：“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

这样，蒯大富作为当年414对立派的领袖，证实了沈如槐、陈楚三前述说法的“真实性”。

难道“历史”真是如此吗？

非也。

#### ◇ 内战需要理由

沈如槐、陈楚三立论至少违背了两个起码常识。

其一，当年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众人皆知，414是从最初的“八八串联会”演变而来的，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造反派与保守派最大的不同，就是拥护和支持文革。4

414只是在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上与团派有所不同。沈如槐回忆录说，414最高峰时有7000人。如果414是否定文革的，那么这7000人会参加414吗？为什么四十年以后，这7000人才听说“414在实质上是否定文革”的呢？他们都上了头头们的当吗？

其二，如果414真是一个“在实质上否定文革”的组织，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它不可能存在下去。

蒯大富的回忆录也说了，毛泽东肯定看过《414思潮必胜》，并且多次批评过414。他老人家那么锐利的目光，还看不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以想象，如果真是如此，不论是整个派别，还是高层领导，毛泽东决不会允许它的存在。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高层领袖，“王、关、戚”这样的中央文革内部的人，甚至像武汉“百万雄师”这样庞大的群众组织，毛泽东都毫不手软。毛泽东何惜、何惧一个清华414？

内战需要一个理由。全国各地的内战也都有自己的“理由”。“414否定文革”，只是蒯大富当年向414发动内战的理由。四十年前，团派的宣传机器为此开足了马力，企图将414头头们送上“公安六条”。当年这个帽子并没有被毛泽东所接受，毛泽东虽然并不喜欢414，但蒯大富未能借毛泽东或中央文革之手消灭414。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清华两派打的就不是“内战”而是外战了，毛泽东一定会支持蒯大富消灭414。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才有了“727”。这说明了什么？

414向团派发动内战的理由，众人皆知，不必细说了。

正因为清华414并非文革的敌对力量，毛泽东尽管不喜欢414，不赞成《414思潮必胜》，但毛泽东并没有对414下手。从十年文革历程来看，尽管毛泽东曾经非常喜欢蒯大富，但毛泽东最终却对蒯大富下了手。

有人说，当年414提出“十七年红线主导论”，与团派的“黑线主导论”尖锐对立，怎么不是否定文革？放在今天的语境中，这很有些迷惑性。一些研究者据此挖掘出许多新的“文革历史”。然而，当年414所说的“红线主导”与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的类似话语，内涵并不相同，实践更相去甚远。毛泽东在文革中后期，也多次说过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且逐步“解放”了许多干部。但这与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完全是两回事。414的“红线主导论”正是属于此类。它只不过是向团派发动内战的一种话语，一个理由。

文革结束后，刘达同志曾主持清华党委做出“文革中清华两派都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支持，并推向全国。这个决议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 ◇ 文革的“两个错误”

毛泽东逝世前不久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文革至少已经进行九年了。“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两个术语是毛泽东的发明。在此之前，没有谁敢如此大胆地指出文革的这两大错误。这说明，他也在反思文革，尤其是文革的缺陷。当然，他的着重点是肯定文革。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对文革最早最公开的反思。

当然，文革不止这两个错误。而且正如邓小平所说，即使就这两个错误，也不能说文革是七分成绩。但从毛泽东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明确持否定态度。这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历史真实。研究文革史，如果忽略、漏掉或回避这个重要的“事实”，那就会对许多历史事件陷入迷雾。遗憾的是，我看到不少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正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考察文革的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从来没有支持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发生这种情况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但在不同的场合，毛泽东又不同程度地包容过“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这是文革时期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迅速将文革打个结，停止无休止的争论，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回过头去看，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远见的。他的“彻底否定文革”的粗结论经得起历史考验。我理解，他并没有否定将来在时间比较充裕、气氛比较合适的时机，再来细致地总结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各种历史经验和教训。当初，如果“宜细不宜粗”地来讨论文革，那就糟了，整个国家就会停止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改革开放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了。

正是因为这个历史原因，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以及它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没有被细致地研究过。而当今的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都与此有关。如果这个问题失真，许多回忆录和文革史研究就难免失真。

文革一开始，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六条》就明确提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并且强调文革采取的方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从整个十年文革全过程毛泽东的讲话与做法来看，他的言行是基本一致的。从毛泽东处于最高掌权地位来看，从他发动文革的目的来看，他也没有违反这些原则的必要。

但是，由于文革的主要打倒对象是毛泽东想象的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又分布在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形成“党内的资产阶级”。他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基层的广大群众组织，冲锋陷阵的是红卫兵造反派。他进行文革的主要方式是踢开各级党组织，他赋予造反派自由行事的权力。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对造反派直接发出指令和进行约束。这就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全国的无政府主义，形成了毛泽东认为好得很的“天下大乱”。在这种背景下，“打倒一切”就再正常不过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除了中央一级和军队外，基本上都停止了。造反派实际上取代了党组织的职能。

造反运动出现的过激行为，例如残酷的斗争方式、打死人、“破四旧”、血统论等等，公正地说，当时的中央是表态反对的。但为了不伤害造反热情，这种反对是一种很“软”的反对。一部分造反派将这种“软反对”理解为真反对，从而停止这类过激行为；但另一些造反派将其理解为真支持，继续并升级了这类过激行为。

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文革后八年，解放了大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为了打倒他心目中的走资派，他包容了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

所以，他也说过：“……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说明，他没有号召“打倒一切”，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包容了“打倒一切”。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文革初期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乎所有老干部都被打倒，文革后期包括邓小

平在内又有大批老干部被“解放”。这种现象，用毛泽东怂恿“打倒一切”无法解释，用毛泽东不包容“打倒一切”，也无法解释。

其实，造反派心里很清楚，他们要打倒的老干部，最终能不能打倒，关键还要上面表态。

文革时期四川有一个故事。文革前，四川省农机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首席代表邓华将军，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的会议。毛主席问：“邓华来了没有？”邓华立即起身答：“到！”毛主席说（大意）：你有什么错误？为什么造反派把你整得那么厉害？邓华无言以对。毛主席挥手示意：“坐下，坐下。”邓华就这样被“解放”了。

◇ “全面内战”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毛泽东对“全面内战”与对“打倒一切”的态度有所区别。“打倒一切”同毛泽东要打倒“走资派”的本意，在方向上有重叠，所以他对“打倒一切”是非常谅解的。甚至可以说，有某种程度的支持。但“全面内战”则不同了。

考察文革全过程，他对“全面内战”一开始就不赞同。道理很简单，“全面内战”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战争，与文革的目的完全不同向。

人们还应该记得，全国性的两大派大体形成于1967年的“一月夺权”前后，随即开始了“全面内战”。“一月夺权”是造反派地位的转折点：即将从“在野”转变为“在朝”。造反派分裂的主因是权力争夺，公开宣称的都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点小伎俩，毛泽东岂有看不出来的？所以他警告红卫兵造反派：“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1967年年中，他看到“全面内战”愈演愈烈，阻碍文革继续推进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他提出：“必须善于将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问题。”紧接着，他又号召造反派：“要斗私批修”。

1967年年底，他更明确地对两大派讲：“两派要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等，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各省市、各部门的两大派做工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联合，建立革委会。并且派出军队对严重地区的武斗进行隔离，或直接干预制止武斗。必要时，对需要保护的单位实行军管。那时候，“全面内战”给中国造成的方方面面的巨大损失无法计算。

从上述讲话和工作能够看到，毛泽东反对内战的立场是前后一致的，态度是鲜明的。还可以看到，他爱护红卫兵造反派这支文革的中坚力量，不愿意一开始就出以重手，希望通过批评、帮助、引导的方式，解决“全面内战”。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容忍了“全面内战”。在“全面内战”拖的时间太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极大伤害，民众已经普遍怨恨，而造反派却始终不听招呼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出以重手。



1968年“727”，他通过结束清华内战，结束了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进而结束了整个国家的“全面内战”。

◇ 什么叫“头脑发胀，全身浮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毛泽东不是在1968年7月28日，第一次这样批评蒯大富。早在1967年，他就曾通过江青之口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江青还说，有人真不害臊，连党员都不是，就想当中央委员。按照一般常理，如此之重的批评，足应使蒯大富悬崖勒马。不妨假设毛泽东如果用这么重的话批评林彪、陈伯达、江青，或者任何中央一级的领导人，那会是什么后果？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这其实也是对全国造反派头头的批评。但蒯大富和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们都当成了耳旁风。就蒯大富当时发胀的头脑来讲，一个中央委员的位置未必就打得住。

今天有人说，文革中学生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工具，一开始就注定要被抛弃。这不是事实。文革前，毛泽东曾经反复说过要培养一大批无产阶级的接班人。文革中，他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想从青年学生中培养一批接班人。他指的就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毛泽东的意图是公开的，连外国人都知道。但红卫兵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他的“招呼”，令他失望。

今天我们看到，金钱能使人疯狂。当年，权力也曾使人疯狂。正是看到了有可能成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前途”，加上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的约束，一大批红卫兵头头“头脑发胀，全身浮肿”。它甚至使得文革无法收场。这时候，毛泽东就不得不抛弃红卫兵了。

我听到一个故事，很有些震撼。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华国锋召开了各省负责人的“打招呼”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讲话精神。四川当时的省委书记召开了省委全委会，提出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要用土改时对待贫下中农那样的感情对待造反派。在此背景下，当年9月2日，他找重庆市两派的一位主要头头谈话，准备给他安排一个重要职位。能够被重新启用，令这位头头感激涕零。但还没来得及兑现，9月9日毛泽东主席过世了，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政治风云突变，省委书记的承诺成了永远的未来。

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位头头心目中的时钟却永久停留在了1976年9月2日。听说此君至今仍念念不忘这个职位。但凡朋友去看望，必说此事。其痴迷状，使我猛然想起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此君文革后判监15年，出狱后自然没有饭碗。当年的朋友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其度过经济难关。但此君心思完全在从政，思想感情顽固地停留在遥远的过去，不善百姓日子，穷困潦倒，让人唏嘘不已。

◇ 当年人们用脚投了票

文革前清华的在校生总数，我记得校方公布是一万零四百人。加上各类教职员工，清华园内总计大约两万人。1967年底到1968年初，六字班分配离校。那么，武斗前清华园内尚有一万八、九。

1968年4月23日“百日大武斗”前几天，清华园已经显现大规模武斗即将开始的迹象，人们纷纷收拾行李逃离清华园，形成蔚为壮观的“难民潮”。据笔者日记，当时估计

留在校内参加武斗的两派总人数不超过一千人。这与蒯大富《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历史》中的回忆基本一致。那么，这一千人与清华园内一万八、九的总人数相比，仅占5%。假设留下来参加武斗的全部都是学生，以未毕业学生总数9000人计，参加武斗的学生只占在校生总数的九分之一弱，即10%左右。笔者当时仍然留在原住的2号楼，继续观察清华局势的发展。我清楚地记得，这座清华最大的学生宿舍楼，几乎成为一座空楼。也就是说，清华园内90%以上的人不参加，甚至反对武斗。这其中，大部分人没有用文字或口头方式表达反对意见，但他们却用脚投了反对票。

如前所述，当时清华的一般民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在拥护并参加文革的前提下，对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文革思想产生了分歧。在众多人的参与下，清华内战初期，出现过对干部问题、十七年“红线”“黑线”问题、左和右的问题、教育战线斗批改等等问题的大辩论、大争论，并从而分裂成两大派。但这种争论并不同于百花齐放，更不是民主条件下的思想自由。这些争论最后都服从于对清华大学权力的争夺，目标指向是拟于1967年5月30日成立的清华大学革委会的两派名额分配。5月30日革委会流产后，争论逐渐变成了大喇叭上的各说各话，又很快转换成大喇叭、大字报上的相互谩骂。

在我的记忆中，两大派形成初始的大辩论、大争论时期，是清华两派的高峰期，也是两大派各自人数最多的时期。估计两派加起来总数在一万五左右。两派各说各话和相互谩骂局面形成以后，两大派事实上的人数逐渐减少，中间派和逍遥派队伍逐渐变大。1967年9月，在各方面做工作予以促进和两派群众的要求下，两派头头不情愿地商量成立“联合总部”，准备合并两大派组织。但“联合总部”虽然表面上达成了协议，但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存在过。“联合总部”失败的原因仍然是名称、名额、谁吃掉谁的问题。两派争论的实质再一次显现在群众面前，退出内战的人数进一步增多。

到1968年4月武斗开始，退出或停止参加派别活动的队伍变成了清华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这是清华当年的历史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清华有一批人公开表达了停止内战、结束分裂、实现联合的强烈愿望。1968年2月29日，“清华大学革命群众促头头掀起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大会”在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大专院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所在地）大礼堂召开。北京市委党校大礼堂被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坐满。据了解，该大礼堂座位在1400个左右。参加这次大会的，两大派、中间派、逍遥派的人都有。参加学习班的清华两派头头悉数被请到现场。大会发言踊跃，群情激昂。北京市革委会的领导人 also 到会表示支持。当时进驻清华大学的海军宣传队从旁进行了协助。据我所知，一千多普通民众向两大派头头面对面地表达反对内战的强烈愿望，这在当时的北京，甚至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但几十年来，类似这样的历史真实，也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内战和武斗是违背清华多数人意志的。今天写回忆录的人，几乎都是当年对内战或武斗比较积极的人。而当年用脚投票的多数人，几乎都不愿再去谈论那段令人厌恶的历史，当起了“沉默的多数”。众多的回忆录和文革史专家，对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事实视而不见。

#### ◇ 结束清华内战不需要额外的理由

蒯大富的《岁月流沙》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有许多反思和悔恨，情真意切。这是值得肯定的。沈如槐的回忆录却基本没有。但蒯大富对毛泽东发动“727”，看来至今没有想通。他的主要逻辑是，制止武斗是可以的，但毛泽东应该事先给他打个招呼。

蒯大富回忆录说，1968年“727”数万工宣队开进清华强行制止武斗，他之所以下令对工宣队大打出手，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来的。如果有人告诉他这是毛主席派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此后的历史研究中，这种质疑越来越流行，甚至猜测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历史“真相”。笔者以为，这样的史学研究，完全忘记了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是史学研究的悲哀。

“全面内战”时期，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发出了那么多制止武斗的官方布告，派出了那么多解放军战士隔离武斗中的两大派，这些全天下人都知道。蒯大富的逻辑是，这些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清华两派的内战是否定的。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需要特别告知他是毛主席派的。那么，其中明显的逻辑是，如果不是毛主席派的，蒯大富将不会买账。这的确是事实。清华的“百日大武斗”前，北京市革委会举办首都大专院校两派头头学习班，要求两派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停止内战，实行联合。蒯大富根本没把它放在眼里。周恩来在1968年2月掀起的“二月春风”，蒯大富也置之不理。海军向清华派出的宣传队，分别向两派做了那么多工作，办了那么多各系、各基层单位停止内战的学习班，蒯大富更是无足轻重。那么，谁能解决清华的内战呢？两派头头们认为只有毛泽东。盼望停止内战、结束武斗的清华大学上万名师生员工，也意识到只有毛泽东。

那么，毛泽东以何种方式干预清华问题，具体干预的时候是否应该先征求蒯大富的意见，或者先给蒯大富“打招呼”呢？当然不应该。首先，这是毛泽东对全国都适用的公开的方针政策，并且长时间、反复多次予以重申。如果这些都不算数，要专门给蒯大富打招呼的话，那么全国所有省市、所有单位都可以像蒯大富一样，要求毛主席先打招呼。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施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政令统一？

蒯大富所谓应该先打招呼的逻辑，实际上是从“内战有理、武斗正义”的逻辑衍生出来的。你如果真心承认武斗是错的，那么谁来制止武斗重要吗？打不打招呼重要吗？

蒯大富打招呼论中还隐藏着一个逻辑，迷惑了众多的文革史研究者。这个逻辑是，蒯大富对毛主席特别有感情，毛主席的话一定会听。毛主席派工宣队进清华，打个招呼，事情不就很顺利了吗？这个逻辑看似成立，实际上不成立。

不错，蒯大富的确是毛泽东亲自解救、培植起来的造反派明星。为此，蒯大富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坚定地追随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但蒯大富像许多造反派领袖一样，强烈盼望从造反派领袖转变成文革新贵。变化了的地位，强烈的欲望，使蒯大富和一大批造反派头头，头脑膨胀。为了欲望，用各种借口对反对派大打出手。这时候，毛主席关于停止内战的所有招呼都听不进去了。这是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连绵的混乱，尤其是久制不绝的武斗，已经天怒人怨。毛泽东为了解决全国的这种局面，寻找突破口，出以重拳，已经水到渠成。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该怎么给蒯大富打招呼？找人带话？早就打红了眼的蒯大富完全可以不相信，可以说是假传圣旨。毛泽东把蒯大富请到面前，当面打招呼？这，蒯大富可能会被镇住。那么，全国各地、各单位是不是要一个一个地照此办理？这个逻辑通吗？728召见时，毛主席也对蒯大富说了，一般性的招呼是早就打了的。蒯大富全身浮肿，头脑膨胀，听不进去。

固然，当年带领和指挥清华工宣队的人，例如迟群、谢静宜等，后来都是“四人帮”的人，他们统治清华期间给清华带来过数不清的灾难。但这并不改变毛泽东委派他们制止清华武斗的正义性。至于蒯大富说，是“右派”给予毛泽东巨大的压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抛弃了他，否则历史将会是另外的样子。这更是毫无根据的自欺欺人。

这种狡辩里还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7 2 7”，谁想制止清华的武斗，打死活该！

这使我想起清华武斗刚开始时，一些反对两派武斗的人曾经想组织几百人的师生员工，在校内举行呼吁停止武斗的大游行。但当时的情况太艰难，敢于参加游行的人数远远达不到期望的规模，最终作罢。幸好这次游行没有搞起来。不然，清华园早在“7 2 7”之前，就血流成河了。

还有人以7 2 7制止清华武斗，采取的不是全“文”的方式，因而对其正义性予以质疑。我只能说，这是关在书斋中的学者的一种良好愿望。制止武斗，完全靠说服，只能是学者们的凭空想象，毫不现实。但工宣队在产生不少伤亡的情况下，坚持不带武器，不实行全“武力”解决清华武斗，应该说十分克制了。半文半武，是客观需要，丝毫不影响其正义性。至于全国有些地方，武斗的制止，采取文的方式多一些，还是武的方式多一些，需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对去收缴武器的解放军，进行武装对抗，后果自然是严重的。蒯大富下令对工宣队武装抵抗，毛泽东大感意外，极为震怒：“蒯大富反了？”。临时决定把北京“五大领袖”找来开会，于是才有了“7 2 8”召见。

对清华文革史的研究，不应该再陷入“打招呼”这种泥潭了。

#### ◇ 结束“全面内战”，代价沉重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角度讲，结束“全面内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北大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源地。清华则是全国造反派红卫兵的发源地，文革地位举足轻重。毛泽东选中清华发动“7 2 7”，实施了文革的一个大转折。

回望历史，我们今天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结束红卫兵运动，就不可能结束“全面内战”，就不可能继续推进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从文革的角度，毛泽东选择清华下手，显然抓住了牛鼻子。

红卫兵运动最终未能按照毛泽东的“引导”，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令毛泽东非常遗憾，而且很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结束红卫兵运动，虽然结束了“全面内战”，同时也给文革自身沉重的打击。应该说，这是毛泽东不得已而为之。这就可以解释，“7 2 8”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对蒯大富感情上那么亲密，为什么不久后又将蒯大富彻底抛弃的矛盾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最终走向毁灭，首先源于文革自身。没有文革，没有对法制与党纪的全面破坏，没有无政府主义的全面泛滥，就不会有“全面内战”。“全面内战”也是红卫兵运动自掘的坟墓。因此，“全面内战”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文革的发动者本人。在此前提下，两大派红卫兵也有各自的责任。

现在有一种倾向，一说文革是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的，似乎文革中只有一个人错了，其它人没有错。甚至史学家也在这样描述文革，这着实令人吃惊。

#### ◇ “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据说，这是邓小平当年拒绝毛泽东，要他主持做一个拥护文革决定时的托词。这一方面显现了邓小平的睿智，另一方面也确是实情，而且是那一代老干部共同的实情。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主持做出否定文革的决定时，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方针。近来的各种文革回忆录，对此颇有微词。

从桃花源中人的角度讲，当年即使有充裕的时间与合适的氛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一批老干部，由于文革中的特殊经历，他们也确实说不细致。即使到了文革早已冷却的今天，那些当年并不在桃花源中的人，能否正确地说出当年的“细”，恐怕还需要打个大问号。

正是由于当年对文革的认识上无法“细”，所以在对文革遗留问题的处理上，也就只能“粗”。“粗”，只要大体正确，还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但太“粗”，就会留下一些问题。

例如文革的责任问题。显然，文革有毛泽东的责任，有“四人帮”的责任，也有造反派的责任，另外还有其它方面的责任。如果混在一起，就太粗了。如果能将其大致分清，那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无疑大有好处。我以为，一些清华校友对那一阶段至今不能释怀，从而难以真正走出文革，这恐怕是一重要原因。而文革的责任问题，又同文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关，同对这些过程的认识和分析有关。当然，要细致地总结文革，还不止这些。

对文革认识太“粗”，还容易使文革妖魔化。科学地总结和研究文革史，以及文革以前建国以后党的若干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需求。

粗线条地总结文革，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特殊需要。但不能永远只有粗线条。粗线条不能回答人民群众对历史可能提出的若干问题，不能解释重要的历史现象。当这些疑问不能得到解决的时候，其它答案就会趁虚而入。这就容易导致文革的妖魔化。

事实上，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文革的妖魔化已经很长时间了。对文革的妖魔化，必然对毛泽东妖魔化，对中国共产党妖魔化，对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妖魔化。其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但无论如何，在那个从文革转向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只能快刀斩乱麻。过多地指摘“宜粗不宜细”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能用科学发展观来研究、解决当前和今后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也有可能用科学的历史观去研究和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认识问题。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 ◇ 关于对文革的反思

文革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感受，太多的教训。所以，对文革的回忆与论述，至今连绵不断。不过，由于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所处位置不同，记忆和感受常常大不一样。

叶志江学长向我们这些文革中毕业的校友们发出了“走出文革”的呼声。我深深地赞同。但要彻底走出文革，必须在内心彻底否定文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利于我们对文革的反思。

防止文革或者类似于文革的事情再次发生，应该是最重要的反思。

有校友提出了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的最后历史责任问题，主张大家把“文革的事实”留下来。但从不同的眼球看出去，“文革的事实”差异是很大的，甚至于完全不同。照相似的文革，恐怕留不下来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把什么事实都留下来。所以，还是有一个观点、角度的问题。写回忆录，或者研究文革史，如果方向不对，它的作用就是负面的。我们这些奔七的人，的确有一个“最后的历史责任”。怎样才是对历史负责，恐怕应该三思。

蒯大富的回忆录有一个问题说得很好。他说：“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痛苦记忆，充分说明，民主必须置于法制之下，民主必须有序。否则，只会导致“暴民政治”。大民主其实就是专制下的“暴民政治”，丝毫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想到那里，说到那里。错了的责任由我自负。欢迎校友们批评、指正。

本文引用的一些内容，请参考以下目录：

- 一、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二版。
- 二、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
- 三、许爱晶《清华蒯大富》，香港出版。
- 四、1968.7.28毛泽东主席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韩爱晶整理。
- 五、《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

（李仕林，男，1947年生。清华大学土建系学生，1970年3月毕业离校。）

□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

## 【抗拒遗忘】

### 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 邢小群 •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为了纪念母校百年，她们几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两年多时间编了一本《远去的女附中》。上报官方机构审读，获准出版。即将开印之际，却收到出版社总编辑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开始五十周年。我们合作的文集《远去的女附中》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将出版之际，被上级叫停。无法出版。我们深知这部书凝结了每一位作者对母校的深情厚爱，对此结果给作者们带来的冲击我们深表理解，也感到万分遗憾。感谢每一位作者为此书付出的心血。感谢大家对出版社的信任。作为出版人，虽然最终未能将书付梓，但我们在

编辑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从书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获益良多。为此，我们要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与谢意！

此信写得很悲情，体现了中国大陆出版人的无奈。其原因，无非是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的悲剧。学校百年，这是一页绕不开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却触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国大陆体制内所有传媒：今年禁谈文革！

对反思文革的严厉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陆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们曾历经沧桑》，20万字的书稿，被编辑删了一万多字，删节的重点之一，就是有关文革的内容。两年前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报》记者独家报道，也受到官方的严厉斥责。

自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个世纪。这个节点，本是回顾与清理文革的契机，但又恰恰是当政者的痛点。他们担心反思一旦形成声势，会危及统治的合法性，于是提前发出禁言文革的内部密令，《远去的女附中》一书就成为这种背景下的牺牲品。

五十年来，大陆官方对文革的态度可分为三段。

毛泽东在世时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标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这种宣传基调。当时怀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处死刑者，不是一个小数字。

毛泽东去世后开始第二段。先是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胡耀邦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体制内出现了系统否定文革的声音。1980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邓小平、陈云等人联手，从华国锋处争得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华国锋是文革中起家的。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邓取代华的历史依据，同时为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制造了舆论。文革头绪复杂，邓小平需要尽快摆平党内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细，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相当多的老干部在文革不同阶段紧跟毛泽东的情况被尽量回避，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康生和造反派头上，毛泽东的首要责任却被开脱。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陆是言说文革相对宽松的时期。文学艺术界涌现了一大批表现文革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影视、舞台剧和美术作品，新闻界采访了大批文革的受难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史学界则开始推出研究论文，中央党校等机构还招收了几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硕士生，金春明、席宣、严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写的几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间问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识界和官方有过一段短暂的蜜月。

1996年是文革30周年，也是第二阶段转变到第三阶段的时间节点。官方对文革的态度由否定和简化，变为回避和虚化。当时，广东的《焦点》月刊因为编辑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被官方断然停刊。北京的《东方》双月刊因为编辑了一组文革研究专题，也受到严厉整肃。官方态度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改变？一是因为邓小平已经不能问事，而新领导人的权力基础与否定文革无关。二是民间对文革的研究出现了独立思考，开始超越官方决议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细的规定，向更加真实的历史层面逼近。文革将不再是混进党内的几个坏人作乱，而是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的有机一环。反思的触角已经伸向极权体制本身。这是当政者不能够容忍的。从此，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艺作品，莫不受到严格的管控，经过官方严格筛选后能够问世者为数了了。相关档案不得开放，影视领域这十年的历史几乎成为空白。文

革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王力反思录》、《吴法宪回忆录》、《邱会作回忆录》、《十年一梦》等，独立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这一动向，又把从香港往大陆带书当作严密监控的重点。在口岸没收书籍，引发了不少纠纷。此外还有大量文革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以民间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现，传播面很小。

1996年到今天又经过了20年。20年的回避与虚化，已经导致了一两代人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这段时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上课时总有学生要求：“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讲文革？”我问道：“关于文革，你们知道多少？”他们说，我们只是在政治课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学老师要求背下这段文字，应付考试，其他都不要问。我说，能不能问问你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们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学生说，他们都不愿意讲。

文革四十周年时，徐友渔、郝建等学者在北京发起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十几个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扰，不敢打电话，也不敢发电子邮件，只好口口相约，一起到郊区密云赴会。

退休高官于幼军，应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开设反思文革的历史讲座，原计划讲七次，受到压力，讲了两次便匆匆结束。

所幸的是人类在这段时间进入了国际互联网时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视、广播、书刊、报纸免谈文革，却不能完全控制网络空间，有关文革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开始通过网站、微博、微信交流和传播。学者吴迪主编的《记忆》、学者何蜀主编的《昨天》，都是学术品质很高的专门文革研究的电子月刊。一些体制内的学术机构，预见到今年举办有关文革的学术讨论会受到限制，赶在文革50周年之前，先行举办学术活动。2015年1月，复旦大学历史学院以访问学者工作坊的方式，召开了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年10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又以“1960年代的中国”为名，举办了一次学讨论会。两次会议的内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义开会，会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已经为此付出代价。

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存在。鸵鸟政策是不能长久的。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唱红打黑，许多做法颇似文革。今年初对任志强的围攻，也被称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这片土地上，随时可能滋长，发作。大陆社会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调回潮。他们不但有网站、社团，举办群体活动，还有人集体为江青扫墓祭拜，召开张春桥思想研讨会。部分地区的底层草根中弥漫开一种文革想象，以为文革年代是工农大众的节日，文革运动是反抗权贵资本主义，争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门。毛泽东的粉丝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与之相联系的是对邓小平的负面评价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后果已经显现。

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渐渐老去。民间有识之士意识到，清理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刻不容缓。而当政者的狭隘和短视之症，人为制造了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摆脱杜牧预言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